The Dimensions of Literary Criticism

Wu Jun

中国新文学研究丛书

文学批评的向度

吴俊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资助
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英文标识简称 PAPD）
南京大学中国文学与东亚文明协同创新中心资助项目
南京大学 985 工程项目经费资助出版项目

The Dimensions of Literary Criticism

中国新文学研究丛书

文学批评的向度

吴俊 著

本书获江苏省第四期“333 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科研项目资助经费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批评的向度/吴俊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中国新文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02-010491-8

Ⅰ. ①文… Ⅱ. ①吴… Ⅲ.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文集
Ⅳ.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15513 号

责任编辑 付如初
装帧设计 陶 雷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46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1290 毫米 1/32
印 张 9.125 插页 2
版 次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491-8
定 价 3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走向世界:中国文学的焦虑 …… 1
顾彬的意义 …… 10
歧义的莫言的暧昧 …… 29
传统的视点:当代中国文学的历史境遇
——在“传统与文艺:2008·北京文艺论坛”的发言 …… 44
林译小说的文学观
——从跨文化角度看中国文学的价值资源 …… 53
以政治为核心:现实与文学的关系 …… 65
困难的关系:当代文学与国民性再认识 …… 77
新媒体时代的文学权利博弈 …… 89
文学的权利博弈:国家文学与文学批评 …… 98
批评的限度和学院批评的位置 …… 110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研究刍议 …… 116
批评史、文学史和制度研究
——当代文学批评研究的若干问题 …… 128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制度性之辨
——关于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之类“国家文学”评奖 …… 142
《人民文学》的政治性格和“文学政治”策略 …… 155
情为何物　情何以堪
——共和国文学之初的情感政治 …… 163

“西部文学”之我见
——在“西部文学研讨会”上的发言 …… 190
“文学上海”的诞生、撕裂与消失 …… 197
长篇小说的视角:六十年文学反思之一 …… 205
从互联网和亚文化的角度看“80后”文学 …… 211
诗人之忧:乡邦何在
——丁宗皓和他的《乡邦札记》…… 216
文体的艺术之境
——贾平凹长篇小说《带灯》读札…… 222
作家的技艺和情怀
——范小青创作研讨会发言辑要 …… 226
文学史的独特书写者
——我看作家赵长天 …… 229
多重跨界的智慧言说
——李其纲、徐芳《小说与诗歌的艺术智慧》读后 …… 232
从个人诗史到新诗史
——易彬著《穆旦与中国新诗的历史建构研究》序…… 236
吴俊教授访谈录 …… 239
从鲁迅到当代(答问录)…… 248
三十年文学片断:1978—2008我的个人叙事 …… 256
可以沉默,不可以不诚
——在业师钱先生身边学做人 …… 289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走向世界:中国文学的焦虑

一、何谓世界?走向什么世界?

如何判断、描述、探讨“中国文学”与“世界”的关系,从近年中国文学界的基本观点来说,主要可以归结为三种(句式):一、中国文学“已经”走向世界;二、中国文学“正在”走向世界;三、中国文学“如何”走向世界?姑且不论这三种说法的短长,它们实际上都暗含了一个共同的思想前提:中国文学与世界的“关系状态”,主要不是一种单纯的文学事实,而是一种关涉文学价值的评判,即可以根据中国文学与世界的关系程度而对前者进行价值判断。同时,这三种说法也都又泄露出了一个共同的心理情结或症状:“走向世界”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的一种重要关切乃至焦虑。——两相结合,借助时下的一个时髦说法,就是中国文学与世界的关系关乎中国文学的核心利益。[1]

显然,这是讨论(宏观范畴的)中国文学(问题)的一种新语境。

为使这种讨论的实际所指和边际有所确定,有必要先对所涉关键词(概念)有所规范。看似比较简单能够搞定的是“中国文学”,实际所指的应该主要是当代、当下、现时的中国文学,进一步明确说,主要就是“文革”后、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2]相对难说清的是所谓世界究竟何指?

世界就是中国(大陆)域外的全球、全世界?还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这两个设问方式的回答既有点涉嫌咬文嚼字的无聊,又

太显宽泛不着边际，还多少犯有同义交叉反复的毛病。将中国文学输出到域外实际空间范围的全世界，事实上并不可能，也没有一种国别文学有此可能；所谓世界必有所空间限定。第二种回答则貌似将中国置于世界之中，实则有点抗衡西方中心的潜台词，意谓在中国（大陆）的中国文学也就在世界之中。只是这种潜台词已经实际取消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问题本身，虽仍不失为一种文学性颇强的说辞，但“世界”因之有了“消失”的可能，这个话题也就没有意义或无从讨论下去了。[3]

中国（不仅是文学）走向世界的问题产生，显然有其种种突出的历史生成缘由，比如可以追溯到清代中晚期甚至明代中国的域外交通，但这个问题之所以每每会成为历史上的当下性焦虑，显然也都有其当下性的特定缘由。从历史上看，这种缘由大多或主要起于中国与欧美的力量和利益碰撞；从当下情境上看，也同样不外乎相同性质的缘由。概言之，在中国的历史经验和域外空间视野中，作为对象和问题的“世界”的产生与中国天下一统观念的崩溃几乎同步，也与默认欧美列强的世界地位和世界秩序几乎同步。——当我们反思西方中心观的时候，大多视其为西方的强权或霸权，但西方中心观恰恰、至少也是经由晚清、“五四”时代的中国精英和先进分子才在中国获得了合法性和正确性。作为一项遗产，不管原因，结果就是中国对其的认可和认同；否则也就不会有“走向世界”问题的产生。[4]

中国语境中对于世界的实际或真实的所指，历来就是以欧美列强为中心的世界观。[5]获得与欧美列强同等、平等的国家与世界地位，也就是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走向世界的基本目标和目的。这种世界观难言绝对的正确与否，但其中形成的挑战和困难因之同样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障碍。

就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这一当下性的专门话题本身而论，如前所说，其中不仅关乎事实判断，而且同时主要（或是潜在地）也含有价值判断。走向世界是否意味着中国文学必须主要以欧美、西方文学的价值观作为准入门槛？或者，是否意味着后者被迫、不得不认可、

包容异质性的中国文学价值观？文学价值当然有其同质性，但同质性在这里显然没有讨论意义；着眼于同质性也就不会有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问题性和焦虑性。只有突出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学的价值异质性，这个问题才会是真实的，并且，也才能最大程度地彰显中国文学的价值独特性。所谓挑战和困难就在于此。不能消弭这种挑战和困难，障碍也就还将长期横亘在中国文学和所谓“世界”之间。

也就是说，如果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是一个真实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恐怕还会延续下去，就像它几乎已经延续了一百多年一样。如果中国文学与世界的关系关乎中国文学的价值地位，并且关乎中国文学的核心利益，那么中国文学的价值地位和核心利益在这种判断视野里，至少在目前、包括可预知的将来，依然还只能是模糊的和暧昧的。——这正是我们和中国文学的焦虑所在。只是有时我们不太愿意自觉地去正视它、接受它，最后放下它。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处理方法，那就是将世界当作一种纯粹性的概念或符号，甚至干脆就视其为一种言说逻辑中的乌托邦，寄予期待，不予落实。我们同样能够获得有关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一种真实语境。

二、海外研究：作为世界（文学）资源的中国文学

但换一个角度看，所谓世界的不确定性和歧义，并不妨碍中国文学作为世界（文学）资源的真实性和使用价值。也就是中国文学仍拥有世界流通的实际交换功能。

不妨由德国汉学家顾彬教授的案例来管中窥豹。我原以为顾彬只在中国才是个争议人物，据说是因为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论”、中国当代文学成就不高要怪罪于作家不懂外文等“奇谈怪论”。[6]于是就有中国学者不仅质疑顾彬的学术水平远不够研究中国文学，而且更严厉地批判其西方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最后还有一个负气之问：“既如此看不起、贬低中国当代文学，为什么还要研究

中国文学呢?”其他姑置不论,这最后的负气一问,倒在某种意义上击中了问题的要害——外国学者为何研究中国文学呢?对于此问的回答,不管是专业技术性的,还是一般性的,在逻辑上都必然关乎中国文学的世界性价值判断问题。

我不能正面回答这一质问,也不可能逐一追问寻求答案。但不妨另求路径进入这个问题。正当顾彬在中国搅得“风生水起”之时,我意外得知他在海外中国文学研究圈里也同样是一个问题人物。只不过海外的风波不如中国这般剧烈,似乎主要是中国风潮的余波,但又反馈到了中国。这是一个极有意思的循环。当我近年几次向日本、美国和欧洲(包括德国)的中国文学研究者问及对顾彬中国文学研究的看法时,除去意料之中的外交辞令外,几乎每个人都对顾彬“苛论”中国文学表达了明确的不屑和反对——与中国学者一样,这些海外学者也并不追问顾彬言论的真相,部分原因或是他们的资讯主要来源于中国对顾彬的反应或反感,甚至有学者不解且生气:“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这么热衷谈顾彬?他在海外根本没有地位,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我个人直接遇到的情况是,因为一个会议发言要将夏志清与顾彬进行影响力比较论,当即就被质疑:“顾彬怎么能同夏志清相提并论?”——此时质问者其实还没有看我的发言稿。就是这样,真相变得不重要了,态度和动机才是最值得探究的。

直到目前还只是少数几个国家才有所谓的中国文学研究界,要说顾彬在欧美的中国文学研究界里根本不为人所知,那无疑是一种表达极端态度的情绪化说辞。目的不应该是在否定顾彬的学术存在,倒是更像“吃醋”于顾彬在中国的流行及明星般的曝光率。而在这“吃醋”情绪的背后,隐隐流露出了另一种潜台词:顾彬不能也没有资格代表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水平,“我们”才是。——谁才是“我们”呢?

随着“中国崛起”的现实,海外中国研究已经不再只限于“文学”研究的意义,“文学”成为海外学者进入中国话题的一种途径,由此途径获得的则是关于中国话题、中国问题、中国研究的国际话语权。

与以往的不同在于,“崛起的中国”现在已经有了赋予、认可、命名这种话语权的权力。海外学者所表达的对顾彬的不满,真实意图或是针对中国文学界“滥用”权力的不满。——顾彬不能、也不应该“独占”中国文学的国际利益。从中不难嗅出一点“利益均沾”的公平待遇要求,也不难感受到海外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力量博弈的激烈性。

海外中国研究的原始资源和基本资源无疑来自中国。在彼此关系上,如果说以往的中国多处于一种被动状态,静观式甚至无知式地“被研究”,比如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虽然具有强烈的“针对”中国的色彩,但是,中国文学界在最初的十几年里并没有对它有过真正实质性的反应。只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国际反响姿态渐趋主动和自觉,有意识地对海外中国研究做出了越来越多的反馈,这种反馈的力量也已经深刻影响了海外中国研究具体成果的国际地位。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中国终于被公认为学术“经典”,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理解为是关于夏著的最终地位的确立和完成方式。作为资源和研究对象的中国文学,已经以一种对话者、互动者、利益攸关者,或者干脆说一种话语权拥有者和批评权威者的多重身份,全面介入了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力量和利益格局中了。海外中国研究者要获得的不再满足于作为原始资源的中国,更是要获得中国反响的积极支持,并且后者还开始成为他们最重要的现实资本。在此意义上,顾彬无疑是最近十几二十年间海外中国文学研究者中最为成功的一位。树大招风,这也就难怪他会有点意外的遭遇。

当然,这样说并非表示海外中国研究纯粹或全部出于功利的动机。但不可否认,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真实语境已经具有了一种现实性和世界性,中国概念具有了当下的国际性和世界性,这种(文学)现实必然影响、改变和重组海外关于中国(文学)研究的力量和利益关注。手上握有一张中国牌,在很多牌局中已经能够决定输赢。这样的牌谁不会觉得越多越好呢?所谓“我们”也就是每一个自信握有中国牌并且置身在“国际”或“世界”的中国牌局中的人。

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这种态势并不能直接定论中国文学是否走向世界，但能直接证明中国文学的某种特定价值功能或用途。做个类比吧，“中国制造”走向世界了吗？它已散布到了全球每个角落。但是如何确定“中国制造”的价值地位呢？中国文学之走向世界，与作为日用品如鞋子、裤子等“中国制造”的价值区别又在哪里呢？中国（文学）的改变，正像中国有了“中国制造”，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焦虑，顾彬之被“抨击”也是这种焦虑的一种折射。但对中国文学的感受而言，这种海外焦虑非但没有消除而且还强化了、加深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焦虑：我们其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在意、敏感“世界”对我们的看法。所以我们才会为顾彬的“垃圾论”而如此群情激奋。说到底，中国文学的世界地位必须获得一种世界性的公认，使走向世界不再成为中国自身的一个问题，这种焦虑才会最终释放和消弭。

从对世界的无知或满不在乎，到不齿于放低身段向全世界公开表露亲近的心迹，以至如今哪怕是一厢情愿地认定“心手相连、天下一家”的文学大同世界，或自信满满地认定中国文学足以独立、傲视世界，都证明了中国文学已经能够做到华丽的转身，也可以同样深切地说明我们真的很在乎那个“世界”。体味其中的骄傲和谦卑，令人感慨无限。

三、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意义

这就要说到所谓“诺奖情结”了。实际上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这个话题中，最实际也是最纠结的莫过于中国文学与诺贝尔文学奖的关系问题了。有足够的理由能够鼓励和支持中国作家对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期待。其中最大的一个理由说出来会像是一个预言家的口吻：只有中国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才能最终证明中国文学走向了真实的世界，中国文学也会由此成为一种世界文学的真实。这当然不代表我的态度和观点，但它应该确实就是我认为的当下中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国文学的一种心理逻辑。——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具体目标，难道不暗暗地、也是羞涩地包括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想象吗？

起码有十年之久了，中国作家、中国文学开始越来越多地谈论诺奖话题，媒体受此感染，后来只要逢到诺奖评选、颁布之前的时节，就将撩拨中国作家谈论诺奖作为新闻炒作由头。印象中的情形，几乎整个中国文学界的老老少少都被卷入其中了。于是一种嘲讽的声音出现了，且同样形成了一种舆论：中国作家集体患上了“诺奖综合征”。近年的情况又有了新变。一是已有作家发表公开言论，声称自己对谈论诺奖话题深恶痛绝，并对上门采访的记者同样严加辞色，一副亟欲与诺奖撇清干系的架势。另一种情况则完全是负面新闻，说是中国作家已经开始用行贿的手段“公关”诺奖评委，希冀得逞。比如报载某作家一掷60万元打理诺奖事宜，比如名人博客爆料诺奖某评委揭露曾有“很多”中国作家企图收买自己。——中国文学与诺奖看起来确实是越来越近了，不仅有一般舆论的各种不同态度，而且还有了与诺奖关系的具体情节，尽管有些并不光彩。这就不能不再次预言：终有一次，中国文学会搞定傲慢的诺奖。终有一次，诺奖会被中国作家搞定。

但我现在要谈的不是这些。应该有必要追问一句：中国作家、中国文学以各种方式表达的诺奖情结有其逻辑性、合理性乃至必然性吗？诺奖对中国文学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与本文的话题有关。

一般看来，诺奖无疑是迄今世界上最具权威性、影响力最巨的奖项。这种地位的奠定及公认，当然与其一贯的评选程序和评选结果直接相关，即诺奖获得的不仅是专业学术认可，也是一种普世道德尊敬。谁也不能否认诺奖可能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但同样谁也不能因此否认诺奖的权威性和公信力。由此诺奖才会成为全世界的一项最高荣誉目标。假如中国文学愿意与诺奖发生联系，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应该无可非议。——难道行贿和腐败关系也无可非议吗？我先验地排除了这种关系存在的可能性；诺奖如果能被行贿，它的程序和结果就不可能被如此认可和尊敬。因此，如果中国文学确实进

入了走向世界的真实语境，它与诺奖的关系，或者说它对获奖的渴望，当然都是顺理成章的。

有些欲望是出于贪婪，有些欲望则是因为自信，也有些欲望是源于自觉的责任或使命。在贪婪、自信和责任或使命之间，不会有截然分明的界线。所谓中国作家、中国文学的诺奖情结固然可以引发种种议论和歧异看法，但不管是理论推演、动机追问还是经验体会，都不足以否认一个基本事实：所有这一切客观上都是对诺奖与中国文学关系的证明。这种证明在最近的十年间越来越确凿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话题乃至结论，也就同时成立并呼之欲出了。

让人焦虑、焦灼的是，中国作家、中国文学至今仍未获得诺奖[7]。这意味着中国文学至少在某种形式上还只在走向世界的路上。我必须相信前文的那个预言，只有诺奖才能治愈中国文学的焦虑症。——并且你可以相信，一旦中国作家获得诺奖，其意义绝不同于、也远高于“中国制造”的走向世界。作为一种标志，中国（文学）价值观开始具有了真切、公认的普世性。

所以，现在谈论诺奖绝不羞耻。或者说，主要从负面评价诺奖情结并不公正。谈论诺奖是中国文学的现实需要和历史责任，谈论诺奖也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一种诉求努力和证明。最终我们的创伤和痛楚将会消失。

注释：

〔1〕近年有几种现象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一是在中国大陆主办的文学国际会议显著增多（以致政府主管部门还出台了旨在限制会议数量和规模的有关规定）；二是这类国际会议和其他一些文学活动的主旨，多涉“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议题，有的会议或活动还直接以此冠名；三是中外文学学者的互访、交流日趋频繁，特别是随着中国高校教育经费的增长，邀请外籍学者来访也因为“不差钱”而成为常态。这几种现象都是以前没有或甚少见，却是21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界和高校中的新气象。

〔2〕如果需要细分确定的话，这里所谓的中国文学，主要当然是指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但也包括了同时的文学研究和有关文学的一般学术成果，这

些文学研究和学术成果的对象、内容则并不以当下、现时的文学(创作)为限。

〔3〕引申一点来说,这种说法在近年有其特定的宏观背景,即所谓中国崛起和中国经验。在某种立场或观念中,“中国崛起”已不再是一种想象,而是一种现实;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彼此地位)变化。而从文学表达来说,“中国经验”的特殊性(价值)则赋予了中国文学“抗衡”世界性的实际能力和逻辑合理性。中国(文学)须从“自我矮化”的历史情境和思维定式中挣脱出来。

〔4〕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也有过另外的世界中心观:中苏交恶前,社会主义的苏联是世界的中心;此后,特别是从“文革”开始,中国自成其世界的中心,并且向世界“输出革命”。1980年代迄今,西方中心观则有了相当曲折乃至暧昧的表达,直到“中国崛起”。世界的多元性和现代化、现代性的多种可能性,基本上是20世纪90年代后才成为中国知识界关注的问题。如今这已同时成为国家发展道路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5〕举熟悉的例子来说,类似“全盘西化”“充分西化”“彻底西化”的观点、言论及同时对中国历史文化、文明的近乎整体性的批判和否定,在陈独秀、胡适、鲁迅直至陈序经的几代中国知识分子身上都有明显的表达。

〔6〕近年已有多个媒体对此作过连篇累牍的揭载,许多学者也卷入其中的纷争,兹不赘举。笔者另有《顾彬的意义》一文刊载于《文艺研究》2011年第10期。

〔7〕指截止到笔者写作此文的时间2011年。

顾彬的意义

德国教授顾彬又要到中国来了。去年(2010年)5月,顾彬教授给他的中国朋友发来一封邮件,说9、10月间要到中国来学术旅行,问他们各自所在的大学是否会有邀请安排,他要提前排定行程,否则临时恐怕没有时间。我因为工作安排,前两年曾代表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具体办理过邀请顾彬来南大讲学的事宜,所以也收到了这封邮件。说起来顾彬教授还是我们南大现代文学中心的客座教授,相互间的学术交流也是一种常态。那几天我正在外地连着参加了两次会议,稍迟了几天回信与他商量来访的时间。不想我们的结果还没有出来,就又收到了他的邮件:既定的行程加上这几天新的邀请,整个中国之行的日期都已经排满了。这次的行程依次包括北京、上海、杭州、合肥、成都、重庆、济南、曲阜、青岛,最后再从北京返回德国。所到之处,都有当地大学邀请讲演,内容或是欧洲哲学、汉学,或是比较文学、中国文学,话题相当广泛,不一而足。据我所知,今年顾彬教授的中国之旅或更有甚之,上下半年的日程都已早早排定了。

这使我想起前年在北京的一次宴会上,主人安排我坐在顾彬教授的旁边,可以方便说话。席间他曾拿出一个记事小本,对我说起近年他在中国访问的紧张档期。当时我的印象是,邀请顾彬须得提前一两年预约才行。现在看来,"顾彬热"好像还没有完全消歇,对他的"审美疲劳"也还没有普遍发生。试想,在我们的记忆和所知范围里,还有哪位外国学者在中国会有如此漫长的学术旅行记录。顾彬

在中国已经“红”了许多年，能“红”这么多年，有点出我意料，在朝秦暮楚的媒体时代也是很为难得。其中总有些缘故的吧？

虽然顾彬在中国文学界早是个话题人物，所谓“顾彬现象”也或有多方面的解读和意义。只是顾彬现象或顾彬的意义，究竟可以引发何种深入一点的联想或思考，可能现在还是很有点意犹未尽的样子。我们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会对他有兴趣呢？在中国的文学界、学术界和媒体业，顾彬究竟是如何“保鲜”的呢？

一、媒体娱乐时代的真相：顾彬被绑架，或新的学术文化生产机制问题

顾彬在中国的成名并成为争议性人物，是因为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论”。虽然事实上如他的原话、原文和后来一再声明的那样，他从来也没有如此贬低、蔑视过中国当代文学，相反他是一个几乎用了一生来热爱、研究中国文学的欧洲人；那些“垃圾”指的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个别作家作品，特别是那些刻意“为钱”“为市场”写作的作家作品。——这些话何时想来也不是什么惊天之论，看不出有耸人视听的动机。而且，稍作一点分析就能明白，假如“垃圾论”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全称判断，当属恶意污蔑，且首先就否定了顾彬本人中国文学研究的全部意义；又假如“垃圾论”只是对中国当代部分文学作品的批评，则这种批评也无甚谈论的价值——就像有人说有些德国文学或日本文学是垃圾一样，放诸四海而皆准，属于无用的真理之类。顾彬比我们中国批评家诚实和有勇气的地方是在他指名道姓说出了谁是垃圾。请相信并非多数外国人也敢这样说出口的。当然，也没有理由据此推测顾彬教授在学术或文学批评之外，有些要故意看不起中国当代文学的“不良”动机，虽然他认为相较于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在语言和精神品格方面都要显得弱些。这是研究者的一种个人观点，算不得刻意贬低或污蔑。但是，“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论”还是流传开了，并且还是最终激怒了中国文学界的众多义

愤之士。甚至于为了“挺顾”还是“倒顾”,中国文学界中人还隐隐分裂出了两种对立的立场和阵营。一个欧洲人,就这样搅乱了中国人的心。现如今,只要提起顾彬,“垃圾论”和因之产生的对立情绪、争执架势,也还依旧存在,只是现在大家都有些累了,但并没和谐化了。不难想象,在这中间也渗透进了明显的民族情绪。把中国当代文学同垃圾联系起来,这在言者(顾彬)和听者(中国人)双方各自的心理上都是会有特殊根源、也是会起特殊反应和特殊想象的吧——比如民族情绪和历史的悲情记忆之类。

在还没有讨论顾彬的学术意义及媒体意义前,先就有了一个基本事实:顾彬在中国的公众形象几乎完全就是由“垃圾论”来塑造的。也就是说,一个并不确凿的理由却产生出了一个真实的结果。而且,更重要、也更有意思的是,当顾彬的原意和“垃圾论”的真实含义被一再明确之后,人们仍然不愿纠正源于自身误解的错误,依然自说自话、顺理成章地将那个“垃圾论”当成是顾彬的说法。显然,“垃圾论”一经产生就已充当了一种关涉公共利益的话题,它不再随顾彬的个人意愿而变化了。说得简洁明白一点,也就是,中国文学和中国媒体正需要这个“垃圾论”。不是顾彬制造了“垃圾论”,而是“垃圾论”绑架了顾彬。——在这其中,隐藏了文化再生产和娱乐生产力的某种真相。

谁又是“垃圾论”的始作俑者呢?据说是媒体出于自身的利益,为吸引眼球而故意使用了似是而非、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手腕,将公众视线引入了事先设计好了的路线,以顾彬的名义造势,而后借势达到自身出位的目的。从市场的角度看,所有的预设目的都达到了,利益相关方都成了赢家。按照一般的逻辑和心理来推断,顾彬有时可能也会显得假惺惺。比如,我就听到过他的抱怨,有的媒体竟然会用“虚构故事”的方式发表对他的采访文章,他非常反感中国媒体(记者)的不诚实,说是讨厌和他们打交道。但也恰在此时,一个电话打进来,有记者预约采访,可爱的顾彬教授马上又会耸耸肩,一脸无奈地说:“没办法,我怕他们不高兴。”他其实是很会配合媒体的。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